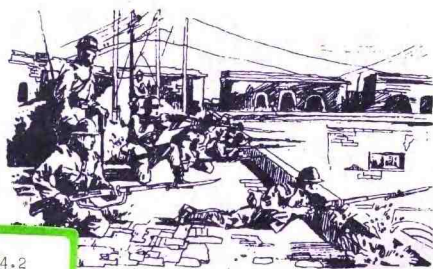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九一八事变



264.2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九·一八事变

野庆裕 编著

目 录

一、大陆政策与《田中奏折》	(1)
二、皇姑屯炸车事件	(8)
三、疯狂的战争准备	(13)
四、制造战争借口	(22)
五、“九·一八”事变爆发	(26)
六、东北的沦陷	(30)
七、伪满洲国的建立	(37)
八、“事变”之后	(44)



C

367905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先变中国东北为它的殖民地，进而征服全中国、征服世界的基本国策，由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经过精心设计的“柳条湖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向沈阳中国军队的驻地——北大营，发起突然袭击，侵占了中国东北。这就是后来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九·一八”事变。

一、大陆政策与《田中奏折》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并不是偶然的。除了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社会制度腐败、内部四分五裂、蒋介石引狼入室的不抵抗政策等自身的原因外，主要还是取决于日本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本性。而所谓“军国主义”，概括地说，就是以大肆扩张军备和对外侵略为国家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国策，而且国家的一切政策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服务于这一目的的。纵观日本近代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对外进行军事侵略、残酷掠夺的历史，而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只不过是其既定侵略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而已。这正如日本近代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所说：“在世界近代历史上，像日本这样从来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而且战争之间很短促的间歇也主要是为了消除上一次战争的后果和准备下一次战争。战争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除日本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

日本之所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日本的封建武士是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些封建武士有两大基本信条：一是认为日本是天下万国之本，妄想征服世界、统治世界；二是崇尚武力致胜，相信武力是立国的基础，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所谓“武士道”精神。这些武士以对内对外的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无上光荣。认为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国防的目的和本质就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就确定了一条露骨的军国主义道路，并开始制定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扩张政策。这项后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政策，始于早期的日本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大军阀——山县有朋。1879年，日本当时的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为了刺探和掌握中国的军备与政局情况，以制定相应的对华方针政策，即秘密派遣以桂太郎为首的10余名军官到中国的华北地区，在北京、天津等地进行探查，并起草了对华作战方案。第2年，山县有朋又派了10多名“中国语研究生”，到中国进行调查活动。根据这两次调查的结果，编写成了详细论述中国军备情况和日本侵华行动方针的《邻邦兵备略》。山县有朋还为此专门写了奏折，于同年11月30日，一起上奏明治天皇。这对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随着山县有朋先后出任首相、陆军大臣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本性，日本的大陆政策便逐步形成。这从山县有朋的一些言论中看得很清

楚。他在1890年3月在呈给天皇的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山县有朋在给天皇的关于《陆军兵制改革奏议》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种观点。他说：“历来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根本，然而，如欲不使此次之胜利失其成效，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必须考虑利益线之开辟。”山县的意思很明显，是说过去的日本只是以武力保卫自己的主权线；而现在的日本，已经强大起来，可以保卫其利益线了。此外，山县有朋1918年提交给寺内内阁的一份建议书中还强调说：“未来我国利权之扩张方向应为中国”，“帝国与中国之地理位置、国际关系，优于其他各国，向中国扩张国权、增进我国之利益，必然是十分有利的。”这里所说的“利益线”，是指同日本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利害关系的地方。也就是说，凡是日本军国主义认为同它有利害关系的地方，它都要用武力去“保卫”。而中国、朝鲜等大陆地区则是日本侵略、扩张的首要目标。山县所说的开辟、保护利益线，就是要加深和扩大对中国、朝鲜的侵略。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侵略政策，就是后来作为其根本国策的“大陆政策”。这一“大陆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用武力征服中国和朝鲜。其步骤是：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满蒙（大体上是指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热河指现在的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的范围）；第四期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期征服全世界。

以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的日本军国主义,在确定和形成大陆政策的同时,即开始发动对中国的军事侵略。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更是标志着日本侵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随后,日本军国主义更是变本加厉地对中中国进行各种侵略活动,而且其侵略的重点也更加明显,这就是直指中国的东北。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继承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全部特权。随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了贯彻实施其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巩固其侵略成果,即开始积极策划进一步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从1906年起,日本先后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了一系列的侵略机构,其中主要的是“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简称“满铁”)、“关东都督府”(1919年起分为“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以及日本驻奉天(今沈阳市)总领事馆。这些机构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其大陆政策、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得力工具。

1905年日本虽然打败了沙俄,夺得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取代了沙俄的地位。但当时从国际形势和日本的实力及其它各方面情况来说,日本还不可能独霸东北,还需要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1906年“满铁”便应运而生。继“满铁”设立后,日本为便于对东北的统治,紧接着又建立了关东都督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主要负责管理东北地区的行政及军事事务。后来,为了协调国内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日本决定废除关东督府,将原来的都督府分为关东厅和关东

军。但基本职责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1919年4月11日,以陆军第12号军令的形式,发布了《关东军司令部条例》,正式建立关东军司令部。按照规定,关东军司令官由现役陆军大将或陆军中将担任,直属日本天皇。关东军自成立之日起,就成为日本设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最重要的侵略工具。在随后的数年内,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制造了一系列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事件,如1919年7月的“长春事件”、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炸车事件”、“1931年7、8月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等,都是由关东军一手策划和实施的。特别是1925年11月23日,受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影响的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挥兵直指奉军根据地——奉天。在张作霖处境危急的时候,1925年12月25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决议,调遣驻朝鲜龙山的日本侵略军,在关东军司令部的直接指挥下,至奉天帮助张作霖,打败郭松龄军。结果郭松龄兵败被杀。事后,日本人即利用这一机会,开始大量增加关东军的数量。从而,使日本的关东军成为一支实力颇为强大、不容忽视的军事集团。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陆军大将、陆相白川义则等军政要员,会议共举行了11天。这次会议除正式议程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秘密议程和秘密活动,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确定对华政策,

中心议题是关于日本的所谓“满蒙政策”。因此，这次会议完全是田中义一为了制定新的更加积极的对华、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的实际主持者森恪，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扩张主义者。在会议之前，他就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的一些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商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的方针。森恪的主张和首相不谋而和。所以，这次会议除了强调东三省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中有着重大利害关系外，就是提出“对于满蒙的主权，日本也有参与的权利。”最后形成了一个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扩大侵华方针的《对华政策纲领》。会议之后，为了进一步落实这次会议所确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森恪又在同年8月13日，在中国大连召开了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参加的“大连会议”，又称“第二次东方会议”。这次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在东北，凡是与日本利益有冲突者，日本都要干涉。

“东方会议”结束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又将会议所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了一个秘密文件，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并于7月25日上奏日本天皇。这就是后来人们广为传说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与后来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关系密切。中译本约有二万四千字，分为二十项内容。主要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和称霸世界的总

战略。它露骨地提出：“按明治大帝的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均已实现。唯第三期之灭亡满蒙，以便征服中国全土。然后再利用中国的资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小亚细亚以及欧洲，还有待于继续努力……”。因此，“欲征服全世界，就必须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就必须先征服满蒙”。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目标并不仅仅限于“满蒙”和中国，而是整个亚洲乃至于全世界。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吞并和全面侵略活动，可以说既是出自《田中奏折》又是完全按照该奏折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的。

“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等4省，总面积约113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日本国土的3倍多，比法国和德国的面积之和还要大。它的东面和东北面隔乌苏里江、黑龙江与前苏联为邻，又临渤海、黄海与日本隔海相望。东北是我国自然资源的宝库。铁、煤、铜、铅、锌等矿产都十分丰富集中，当时东北地区生产的石油占全国总产量的93%，冶铁量占73%，黄金开采量占55%，铁路线占41%，另外森林面积积达1800万公顷，占全国的1/3。这对于资源贫乏而又富于侵略性的日本帝国主义极具诱惑。因为东北既是它的一个原料资源丰富、地理条件方便的供应地；同时，对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工业来说，中国东北又是它的一个重要市场。东北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决定了它本身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

要策划者——板垣征四郎，在 1931 年 3 月所写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一文中这样说：“从战略上来观察，满蒙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岭、七龙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众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由此看来，满蒙在军事上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国东北当作一块求之不得、咬住不放的大肥肉。

二、皇姑屯炸车事件

“东方会议”确定独占“满蒙”为最高国策后，日本关东军即制造了以炸死张作霖为目的的“皇姑屯炸车事件”，企图乘炸死张作霖、造成东北政局混乱之机，借口“维护治安”，出兵占领中国东北。

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是由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张作霖依靠日本人的扶植取得了东北的统治权，并于 1927 年 7 月带兵入关，与直系军阀一起掌握了北京政权，随着自己势力的逐渐扩大，他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因为日本侵略的胃口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这直接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日本在“东方会议”后，即对张作霖提出了进一步控制东北

的各种要求，而张作霖对日本人的要求，既不敢公开反抗，又不想完全听命，因而便采取了拖延的策略，这便引起日本的不满。

另外，在此期间，中国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取得了南方政权。1928年春，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举行北伐，向控制北京政权的张作霖发动进攻。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强行逼迫张作霖答应扩大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当蒋介石军队逼近北京时，日本政府于5月18日向蒋介石和张作霖同时发出备忘录称：现在动乱已波及京津地区，东北也有受其影响的可能。而维持东北的治安，是日本最重视的问题。如果现在动乱涉及到东北地区，日本政府将全力阻止，并将采取“适应措施”。这里所说的“适应措施”，就是绝对禁止蒋介石政府的军队进入东北，解除张作霖军队的武装，使张作霖成为只有仰仗日本人的鼻息才能生存的光杆司令。很显然，这是日本人对蒋张双方的警告。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开始向奉天集中，并沿京（北京）奉（沈阳）线向锦州、山海关出动，准备以武力占领东北。为了进一步向张作霖施加压力，日本公使芳泽奉田中首相之命，劝告张作霖收兵回东北，并威胁说：如不听劝告，那么东北军一旦失败而退回东北时，关东军将在山海关进行拦阻。在此情况下，张作霖被迫同意离开北京，率师退回东北。

就在芳泽劝告张作霖的同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

大佐等人策划的杀害张作霖的方案正在加紧准备。河本的方案是：当张作霖乘车回奉天时，在京奉铁路上炸车除掉张作霖。炸车地点本来选在巨流河铁桥，可当着手准备时，却发现该处奉军戒备森严，无法下手。于是便改在皇姑屯附近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桥洞处。负责执行这个计划的是日军独立守备队东宫铁男大尉，他指挥由朝鲜调到奉天的日军工兵队在选定的铁路交叉处埋置了足够的黄色炸药，并在附近埋伏了一排日军。日军为防止在事先被人发现，在炸车事件发生的前8天，就在这一带设置警戒哨，不许行人通过。这种异常现象曾被当时的奉天城宪兵司令齐恩铭发现并电告在北京的张作霖，请张早做防备。但张作霖对这个报告未予重视。

6月3日，张作霖及随从人员乘专列由北京出发回奉天，这时，派驻北京侦察张作霖行踪的关东军参谋竹下义晴立即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当张作霖的专列通过山海关、锦州、新民等重要地点时，预先派遣的日军侦察人员，接连不断将专列通过的时间及地点准确地报告奉天。同时，为确保万无一失，南满铁路运行的火车全部停止。当张作霖的专车平安通过天津、山海关并于4日晨接近奉天时，车上的人员都松了一口气，以为不会出什么事了。可怎么也没想到，当专列于5时30分通过皇姑屯车站，行至南满铁路桥洞时，一声巨响，将张作霖所乘贵宾车厢和3节客车炸翻，张作霖被当场炸成重伤，还有多人被炸死炸伤。

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为掩盖事实真相，立刻调动工兵

赶修被炸铁路，并处死2名中国人，在尸体上穿上国民党北伐军的衣服，伪造了“国民军东北招抚使”的3封书信，炸弹2枚，布置了一个假现场，声明经调查后确认是南方的便衣队搞的，以掩盖其阴谋。但是，“皇姑屯事件”是日本侵略者企图占领中国东北而制造的这一事实，是任何人也无可否认的。对此，该事件的直接策划者河本大佐在战后所写的回忆录中作了详细的叙述。

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后，迅速被送到市内的帅府，但因出血过多无法挽救，在当天上午9时30分死亡。但因为担心张作霖死亡的消息传出后，日军会乘机发难，因而东北当局决定严守秘密，封锁消息，一切待张学良由北京回到奉天后再决定。

张学良在得知其父亲被炸死的消息后，立即化装潜回奉天处理后事。半月后在宣布张作霖死亡的同时，张学良出任奉天督办。7月4日，又宣布张学良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此外，张学良还表明了国家统一的意向。

日本为了使东北完全脱离中国以达到其侵略之目的，在张学良就职后，即对张学良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措施。先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奉田中首相密令，三次警告张学良。在8月8日张作霖的葬礼上，日本政府派林为特使，又对张学良提出警告，并威胁说：如东三省与国民党政策妥协，影响到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日本关东军将采取“自由之行动”。张学良在强敌威胁下，一面与敌周旋，一面派代表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在国民党政府答应将热河省划归东北，每年拨东北军饷一千

万元并任命张学良为国民党政府委员的条件下，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称：“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并在东北改挂“青天白日”旗。这就是历史上的“东北易帜”。张学良的通电，既表明了国家的统一，又表明了日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武装占领中国东北阴谋的破产。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又促使日本人更加疯狂地进行战争准备。对此，“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花谷正，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说：“河本大佐曾经打算乘炸死张作霖的机会占领满洲南部，但失败了。如果那次干得漂亮，后来的满洲事变也许在那个时候就发动了。……从炸死张作霖事件中所得出的教训，是要制定周密的计划。考虑起来，那时的时机还是不成熟的。”花谷正的这段话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皇姑屯事件”，确实是为了制造出兵侵占东北的借口，只是由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还不成熟，才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不过，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虽然从事件的本身看，具体参与制造“皇姑屯事件”的只是河本等少数人，但日本的许多军政要员都同这个事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岗长太郎，就可以说是该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军政要员的指使和支持，没有“东方会议”所确定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最高国策”，河本等人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可能制造如此重大事件的。因此，“皇姑屯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它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其“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

三、疯狂的战争准备

中国东北地区丰富的物产，军事上的战略地位，早为日本侵略者所垂涎欲滴，因而在“东方会议”之后，即加快了以武力占领的步伐。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按照其“大陆政策”的总方针和“东方会议”所确定的侵华策略，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活动。

其中，为了“名正言顺”地吞并中国东北，日本人首先是千方百计地寻找侵占东北的“理论根据”，进行舆论方面的准备。而实际上这种舆论准备，早已随着“大陆政策”的形成而开始，在“东方会议”后逐步得到加强，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达到了高峰。在制造侵略舆论中，不仅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各个侵略机构特别卖力，就连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极右分子，也一齐出动。他们四处演讲，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散发传单，狂热地鼓吹各种所谓的“合法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制造占领东北的“合法性”，竟然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日本政友会头目、著名的极右翼分子——森恪公开宣称：“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蒙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蒙的领地。而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本土的十八省。本土的汉族对满蒙地区历来都是不关心的。以

此来看，中国并不具有对满蒙的主权。”森格的这一主张，不仅在日本各个阶层都有很大影响，而且还受到日本首相田中的赞赏。

第二，强调满蒙与日本的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认为满蒙对日本来说，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需之地区”。因此，一定“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

第三，极力鼓吹武装占领中国东北。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决定要吞并东北，并已成为其基本国策的重要一环，但为了掩人耳目，在公开场合一般还是用“维护帝国在满蒙的权益”之类的外交辞令。而到了1931年上半年，就开始公开鼓吹武装占领的问题了。1931年1月24日，日本满铁调查科长佐多弘治郎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演讲时说：“要建设大日本的超级大国，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很显然，这就需把满蒙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这里所说的“绝对权力的统治”，说穿了，就是军事占领之意，在这种近乎一边倒的舆论煽动下，日本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达到了新的高度。为了扩大影响，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9月7日，驻日本京都的第16师团第3飞行联队，竟然派飞机在日本的广岛、福冈、松山、富士山、金泽等地上空，散发十多

万张传单。传单题为“醒来吧，国防！”其内容除了极力主张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外，还附有一张注有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的详细图解。

在日本人为吞并中国东北所做的各种准备中，军事方面的准备可谓是整出戏中的重头戏。为了加快扩军备战的步伐，日本整个国家的工业体制全部转入战时轨道。另外，大规模的扩军备战需要资金的保障，所以尽管当时的日本财政已经很紧张，而且其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的比例本来就很高，但为了扩军备战和发动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人还是不断增加军费开支，扩大军事预算。仅以 1930 年来看，日本陆海军的军费开支就占全年总收入的 27.8%，到了 1931 年则上升到 29.7%。而 1931 年军费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英国是 24%、美国 21%、法国是 22%、意大利是 24%。日本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名列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首位。“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保证战争需要，其军费开支更是逐年递增。详见下表：